

21世纪鲁迅的精神文化场还会存在吗？

必须在新时期文学与鲁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得到较为客观而公允的答案。

新时期文学

鲁迅

与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破译鲁迅“国民性”，研究中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难点。

赋予“国民性”以“众趋人格”的研究意义。

创造性地提出鲁迅的“国民性”是一个兼具开放性与自足性命题的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常立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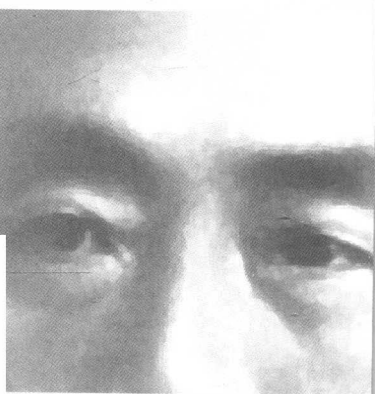
常立霓·著

鲁迅 与

新时期文学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新时期文学/常立霓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978-7-80681-960-9

I. 鲁... II. 常... III. ①鲁迅(1881~1936)-研究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K825.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167 号

鲁迅与新时期文学

著 者: 常立霓

责任编辑: 张晓栋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1-960-9/I · 143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一

当鲁迅不再开口的时候，“鲁迅”就变成了一个话语场，形形色色的人们在这个场里谈论着关于他的“是”与“非”，“罪”与“过”。但每次狼烟四起之后，只剩下一地的唾星四溅，之后就连这四溅的唾星也无处可寻了。

这难道就是鲁迅在当代的意义吗？

经过几十年的课本教育与主流话语的努力，鲁迅终于被成功地构建成具有硬骨头精神的“民族魂”的象征。仅仅用模糊不清的“鲁迅精神”就能完满地解释当代人对鲁迅存在意义的疑问吗？我感到困惑。

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则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鲁迅无疑是 20 世纪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然而我们研究鲁迅，不仅仅是估定他的伟大与否，更重要的是他与现实之间紧密的联系，否则，研究他将失去现实意义。尤其在当下鲁迅（包括鲁迅研究）遭到反思与质疑的时候，鲁迅对于新时期文学是否还具有存在的意义？新时期作家成绩斐然，然而是否已经超过了鲁迅？与鲁迅作比，他们的独立价值又是什么？21 世纪鲁迅的精神文化场还会存在吗？诸如此类的疑问，必须在新时期文学与鲁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得到较为客观而公允的答案。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域，仍旧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使二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互为参照，相互阐释，发现

他们在不同历史层面各自的独立价值。

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显学,研究时序之长久,研究成果之丰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个体研究领域内,几乎无与伦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没有新的生长点。因为鲁迅是将个人的生存体验纳入到全人类的命运中去的,因此鲁迅及其文本潜在的生命力不断地激活人们的想像力,诱使人们不懈地去解读,去发现,鲁迅研究永远处于“未完成时态”。

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观照,鲁迅研究渐呈开放的体系。以鲁迅及其文本为发散点,辐射出去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态势及规模。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成千上万篇,难以一一梳理,这里只借助有关专著来了解一下研究状况。如果我们把这些研究图式比喻成一池水的话,那么我们扔进水中心的小石子相当于研究对象——鲁迅,由此以小石子为中心漾出一圈一圈的波纹,离小石子最近的是“现代文学”,其次是“外国文学”,第三是“近代文学”,最后是“古代文学”。这种研究结果显然和“影响鲁迅”或“鲁迅影响”的亲疏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与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开始得较早,成果也最多。有个体比较研究的,如《鲁迅与林语堂》^①、《鲁迅与茅盾》^②、《鲁迅钱钟书平行论》^③,也有总体比较研究的,如《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④。鲁迅思想及创作很大程度上“别求新声于异邦”,尤其是俄

① 董大中《鲁迅与林语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李继凯《鲁迅与茅盾》,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王富仁《历史的沉思: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成果绝不逊色于前者。有些是个体比较研究,如《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①、《“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②,还有《鲁迅比较研究》^③中系列文章《鲁迅与拜伦》、《鲁迅与安德烈夫》、《鲁迅与夏目漱石》,不过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与国别文学的整体比对上,研究者除了中国的,外国学者也积极投入到比较研究中,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④、《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⑤、《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⑥、《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⑦、《鲁迅与日本文学》^⑧、《鲁迅与英国文学》^⑨。与前两者相比,“近代文学与鲁迅”、“古典文学与鲁迅”研究者相对要少一些,但有关专著仍有问世,如《中国近代文学与鲁迅》^⑩、《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⑪、《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⑫等。其中一度引起轰动的是1967年苏联谢曼诺夫出版的《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书中提示了鲁迅与近现代文学的历史关系,它对以后的鲁迅思想及创作之“源”的研究影响深远。

不过,在这一研究体系内,由于新时期文学在空间与时间的

① 李春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魏韶华《“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④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 韩长经《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⑦ 程麻《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⑨ 高旭东《鲁迅与英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⑩ 牛仰山《中国近代文学与鲁迅》,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⑪ 廖诗忠《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⑫ 许怀中《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站位上,均处于不利地位,成为比较文学视域内鲁迅研究的盲点之一。

从新时期以来 20 多篇零星讨论个别作家或者某个创作流派与鲁迅之间关系的文章分析得出,这些文章共同偏失之处在于: 1. 常常预设鲁迅为一个静止不动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参照标准,以这个经典模本去“套”甚至于“俯视”新时期文学,在这种不平衡的比较情境中,忽视了新时期文学的价值。2. 挖掘鲁迅的当代意义,大多从品格、精神及内在气质等外围方面阐释,但很少从文本本身去探寻他的当代价值。3. 即使纳入比较视野的,也多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新时期文学,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寻根文学”,且多语焉不详,点到为止。较有价值的是 1996 年孙郁的《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一文,第一次从历时态与共时态两个层面较为宏观地梳理了鲁迅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但此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它是“提纲式的、零碎的想法”^①。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以余华与鲁迅的文本细读开始。这些文章为本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些帮助。从以上研究限域可以看出,鲁迅不仅被新时期的读者淡忘了,实际上新时期的研究者们无形中也淡忘了他。

近五年内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的专著有六七本左右:王富仁、赵卓的《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②、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③、朱寿桐的《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④、一土编著的《21 世纪:

① 孙郁《当代作家评论》,1996 年第 5 期。

②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朱寿桐《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

鲁迅和我们》^①、程致中《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②，以及高旭东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③。这些专著一是集中在近几年几起“鲁迅事件”的归总上，二是集中在新时期思潮对鲁迅所代表的理想精神的冲击上，还未涉及文本内的研究。

国外的鲁迅研究向来比较滞后于国内，一类是与中国有着相似近代经历的国家如日韩等，多以共同被殖民的记忆语境来理解鲁迅，或者与中国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有某种共识的国家如苏联。另一类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因意识形态的隔膜而造成的文化传播上的隔膜。鲁迅研究的异域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先译介，再进行本体的研究，之后进入影响研究。本课题的性质又决定了它是鲁迅外围研究中的外延研究，所以起步较晚。不过，惟独在本论题上，外国学者却表现出特别的敏锐。早在1982年，英国的学者清纳里发表《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就首次关注到这一问题。“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清纳里，在英国的《中国季刊》1982年9月号上发表一篇角度新颖的论文《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同的论题在国内外都很少见。该文对鲁迅小说的分析流于一般，但作者在分析刘宾雁、高晓声、苏叔阳的作品特点的同时，来说明鲁迅传统的命运，显出很强的现实感。”^④另外，在1999年东亚鲁迅学术会议上，韩国学者金河林提交的《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一文，具体列举鲁迅如何对六位现当代韩国作家金光均、李光洙、韩雪野、李炳注、柳养善、朴景利的影响。与会者对此给以高度评价：“在国外的鲁迅研究中，类似上述韩国学者的研究，已属凤毛麟角。”以上两篇文章在内容的论述上还显稚嫩，但能从当代文学的角度，以文本为研究对象去探讨当代文学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其创新的精神难能可贵。

① 一土编著《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程致中《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 高旭东《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张杰《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三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试图通过对本论题的论述,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第一,辨析当下文化思潮中鲁迅精神的危机。鲁迅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而且也得到了几乎全方位的论述。钱理群的“逆向思维法”提供了一种颇有意义的思考方式:“文学上新的开拓,蕴含着新的‘陷阱’,发展到极端就会酿成新的危机。”当 20 世纪末各种思潮涌现进来时,当鲁迅被人们过度阐释时,的确已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与潜挑战,造成了当下文化思潮中鲁迅精神的危机。一方面,新保守主义在反思激进主义的同时,谴责“五四”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对五四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与否定,虽然鲁迅很少被点名批评,但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首当其冲成为批判的隐性目标;尔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带来的理想的缺失与世俗主义的盛行,不断地稀释、肢解、误读、消解着鲁迅及其命题。他们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他提出的命题已不具有现实意义^①。与此同时,在日本等国家也出现了鲁迅精神危机,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描述:在日本,“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慢慢消失,学生们连鲁迅的名字都有感到陌生,过去随时都能买到的鲁迅作品的译本,现在市上几乎不卖了。这反映出近十年来日本文化界对待鲁迅比过去非常冷淡,鲁迅的名字几乎被忘掉”。他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造成鲁迅的影响力被淡化的原因,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鲁迅基本上是存在于‘现代性’当中的。在这个层次上说,在 21 世纪的日本,甚至中国和韩国,以社会的规模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接受鲁迅的条件了,就是说,想让一般青年人感兴趣已经做

^①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

不到,文化全球化促进了这条件。”^①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这股思潮终于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非鲁”潮。如韩东等“新生代”作家带有倾向性的调查报告得出的“断裂说”,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不满,与之断裂的决心;王朔《我看鲁迅》、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是对长久以来过度阐释鲁迅、神化鲁迅的一种反感;刘禾的《国民性理论质疑》、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周宁的《“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等,一石激起千层浪,从鲁迅“国民性”中暗藏的“殖民文化”入手,重新思考鲁迅的“国民性”;还有崔卫平《阁楼上的疯男人》等都提出了与主流异样的声音。这股潮流由宣称与鲁迅断裂,到非鲁,再到贬鲁,直至升温到倒鲁。这股非鲁潮虽然对鲁迅非议的角度不同,但都基于同样的逆反情绪:过度地阐释鲁迅。鲁迅已经变成了一个像人生、像爱情这样的话语集合场,任何人包括文学家、政治家,沽名钓誉者有之,释放一己欲望者有之,在这种阐释中,鲁迅好像什么都是,又好像什么都不是。鲁迅变成了“学”、变成了“场”,人们在其中不断地构建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地图。所以,与其说反对者们反对的是鲁迅本身,不如说反对的是对鲁迅的阐释,是对鲁迅的过度阐释,是对以“鲁迅”这个无所指称的虚妄符号所代表的神圣、权威等,以及加诸在这之上的话语霸权、意识形态、符号功能等等令人生厌的东西。

对于鲁迅,没有必要去打倒,无论是鲁迅本身,还是被构建的鲁迅,都已经作为一个强大的事实存在了,我们无需也不可能打倒他,另外也无理由更无必要宗教徒式地捍卫他。对于鲁迅的研究,不是把他制造成一个事件,一个热点,或者是一次无聊的议题,而在于扎实的研究工作,只有真正基于文本的研究,才能得出理性的评价。

^① 唐政《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4期。

第二,激活鲁迅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越来越趋于成熟,但越来越经院化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鲁迅研究的衰朽与危机。

由于徘徊在传统的话语系统内,出现了大量相互雷同,缺乏新意的研究文章。在当代新的语境中,将鲁迅思想命题中的普遍内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重新发现过去多少被我们忽视了的鲁迅思想中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延续,为鲁迅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回到鲁迅本身”的口号曾经在80年代中期为鲁迅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然而鲁迅研究并非只是回到鲁迅本身,仅仅阐释鲁迅是不够的,鲁迅也要受到历史与时空的局限,他不是神,无法像神一样主宰一切,他也不是先知,不能预测身后事。他只是以其哲人般的睿智、殉道式的生存体验提出自己的命题。鲁迅对于命题的理解只是属于一己之见,并非金科玉律。观念和观念经过个体生活世界过滤之后的产物是不同的。新时期文学在新的语境中经过不同个体的体验,应该做出自己的判断,新时期文学所要做的,正是在鲁迅止步的地方继续思考与探索鲁迅未完成的命题。

第三,新时期文学对鲁迅的扬弃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价值。新时期文学与鲁迅之间关系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亦步亦趋地继承。其实现实状况远比这复杂。新时期文学在承继鲁迅命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质疑乃至解构着鲁迅曾经深思过的一些命题。本文的重点不仅仅关注新时期文学对鲁迅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关注鲁迅的命题在当代的际遇如何,在对鲁迅及其命题的理解中新时期作家的主体性是怎样发挥的?新时期文学真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对于它的认识需要的是明晰的理念与历史的参照。在新时期文学与鲁迅双向互动的比较中,新时期文学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在继承鲁迅的同时又反叛着,至于它继承下来的是什么,反叛掉的又是什么,不同作家的取舍有怎样的不同等等,正显示出新时

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念。

本书设四章：第一章首先概括新时期作家对鲁迅“承继式”、“文本式”、“消解式”三种解读方式，其次从“原型”、“模式”的角度阐述鲁迅作品中的“原型”、“模式”在新时期文学中如何遭到置换、变形、消解。第二章以“国民性”问题为研究对象，重新梳理与界定“国民性”的概念，分析新时期作家如何多向度地承继鲁迅提出的诸多重要命题，另外，该章还重点论述了鲁迅“国民性”研究的困境。第三章主要论述文学功能由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救亡”转换到当下“消费时代”的商品，并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文学要素的重新厘定、文化观与精神状态的根本性变化。第四章通过与残雪作品个案的比较，分析鲁迅与残雪说“不可说”的方式。

本论题的属性决定了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从文学的角度，而且兼采哲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既能在总体上有所突破，又能在微观上有所创新。

笔者力求在以下一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鲁迅“国民性”的研究困境及其研究前景。

二、破译鲁迅“国民性”研究中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点、难点。引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赋予“国民性”以“众趋人格”的研究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鲁迅的“国民性”是一个兼具开放性与自足性命题的观点。

三、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发现鲁迅“国民性”中兼有“人性”与“国民性”的双重视角，继而研究新时期作家在这两个视角中如何分解式或消解式地承继。

四、以“原型”为研究点，分析鲁迅文学在新时期怎样被“当代化”。如“阿Q”人物形象在新时期从“文化原型”、“国民劣根性”、“精神胜利法”等三个层面被置换变形；如通过比较鲁迅的《复仇》与残雪的《突围表演》，分析鲁迅创制的“看/被看”等模式如何被新

时期作家解读。

五、新时期作家对鲁迅文化观的创造性解读。如韩少功静态的“层次文化观”与鲁迅动态的“解构主义文化观”的对比,又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张承志的“洁”文化观与鲁迅的“吃人”文化观之间的关系。

六、以语言哲学为理论指导,通过鲁迅与残雪“说‘不可说’”命题方式的比较,分析造成鲁迅言说困境的真正原因——命题的“不可说”,以及鲁迅与残雪如何说“不可说”。

新时期文学纷繁庞杂,鲁迅深邃丰富,加之研究者对鲁迅的过度阐释又增加了辨识的难度,致使本论题无法面面俱到,笔者只能以鲁迅提出的一些具有跨时空性质的命题作为研究纲目与突破口,选取几个曾经长期思考过的相关的研究点,将新时期部分作家或作品纳入比较视域,深入下去,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力求做到观点的原创性与公允性,论据的可靠性与客观性,论证的逻辑性与严谨性。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新时期作家对鲁迅的读解	1
第一节 “阿 Q”原型的置换变形	7
第二节 “模式”的消解 ——从《复仇》到《突围表演》	43
第三节 文化观的创造性读解	56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与“国民性”问题	73
第一节 “国民性”问题再思考	73
第二节 新时期作家对“国民性”的多向度承继	89
第三节 鲁迅“国民性”研究的困境 ——兼述新时期鲁迅“国民性”研究	123
第三章 从启蒙时代到消费时代	142
第一节 有关文学要素的重新厘定	143
第二节 “撤销文化记忆”的主题	159
第三节 精神的张力与失控	173
第四章 不可言说的言说	185
第一节 “可说”的和“不可说”的	186
第二节 说“不可说”	191
参考书目	223
后记	229

第一章 新时期作家对鲁迅的读解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余华《余华谈〈孔乙己〉》

鲁迅是现当代文学中永远也无法终结的一个话题。对于鲁迅的文学地位，无论在什么样的特定情景下受到怎样的质疑或捍卫，鲁迅对于后世作家的影响，是中国现当代其他作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鲁迅作为一个话语核心，一直延续到新时期，而新时期作家对鲁迅的多种读解也正是鲁迅在新时期文学中仍存在强大文化场的有力证明。大体来说，新时期作家对鲁迅的读解方式有三种情况：承继式解读型、纯文本式解读型和消解式解读型。这三个概念是在相互参照的意义上理解的。

承继式解读型作家大多在特定时期对鲁迅的某些命题基本上不加深思考地全盘接受，这在新时期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要否定这类作家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不是有意在否定他们的创作价值，是单就他们对鲁迅的认知而言的，而他们对于

鲁迅的认知又源自于这样两条主要途径：一是毛泽东对鲁迅的“文化革命主将”与“民族英雄”的定位，二是在“文革”时期的文化荒原中，鲁迅的作品是侥幸存在下来的稀有文化资源，当然，就是这文化资源，也是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了。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新时期的一部分作家对于鲁迅的接受存在着奇特的现象，他们既熟悉鲁迅，熟悉到了几乎本能接受的状态，但他们又对鲁迅陌生，陌生得几乎说不清楚鲁迅。正是在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情况下，盲目而被动地解读鲁迅。也就是说，鲁迅基本上成了一种权力话语现象，而新时期初期作家则基本上是在“霸权话语”之下解读鲁迅的。正如新加坡的著名学者王润华先生曾把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专项研究：“鲁迅在新马，由于被过度推崇，最后也被尊为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文学的最高标准，一直影响着新马的文学产品。”^①他还由此认定鲁迅由原来的反殖民者最后被制造成了在新马文学中的“殖民者”。作家刘绍棠谈及鲁迅的影响非常具有代表性：“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个人的风格；但是，不能数典忘祖，我们都应该是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宗师和奠基人鲁迅先生的儿女。因而，条条道路，只能一个方向，也就是鲁迅的方向；因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②另一位作家吉学沛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也洋溢在字里行间：“要真正地了解和认识鲁迅谈何容易！他那博大、精深、锋利的思想，古朴、冷静、完美的艺术风格，坚贞、顽强、无畏的战斗作风，以及他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孺子牛’精神，既像巍巍的高山，又似浩瀚的大海，无论怎样瞩目，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③正是这样一些宏大而模糊的表述让我们对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感到困惑。

①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本土多元文化的思考》，文史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③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当代作家谈鲁迅》，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如果说以上这种承继型的解读是把鲁迅经典化、模式化、抽象化了的话,那么在新时期还有一种形式的承继,这种承继是隐形的、甚至于不被作家意识到的,它是经过阅读者的再创作再阐释后赋予的意义,我们暂且把它看作非主体的承继。比如人们在新写实的琐细的生活枷锁中发现了鲁迅那“无事的悲剧”;人们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看到了《故事新编》消解传统文化与经典的后现代因素;人们在批判性的作品中看到了“国民性”的影子,人们把与不合理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特立独行者视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如张承志、张炜、梁晓声)。鲁迅的不中庸、现实战斗精神,都成了今天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走出主体迷失的凭藉。

正是以上一显一隐两种方式的解读,鲁迅精神就此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经典文化的代表,一个理想人格的象征,而不是去回照鲁迅本身,正如鲁迅一直期待的在昏乱的暗夜中需杀出一个英雄来,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的象征,因此鲁迅作为“民族魂”被选中了。在这一类解读中,作家是被动接受的,或者说作家的接受过程是被动的。有些作家也许甚至连鲁迅的作品都没怎么读过,或者仅限于中学课本上的那几篇,就声称受到鲁迅的影响,但又说不清楚哪方面受到怎样的影响。

第二种是纯文本式解读型。这类作者并不盲目地去否定或轻易地去肯定鲁迅,他们不受他人对于鲁迅解读的影响,而是用一个作家面对另外一个作家时的平静又平等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只以文本为中介,以一个作家细腻的感受去解读另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意在贴近“真实”的鲁迅。如王安忆、残雪、张承志、李锐、余华、莫言、阿来等就属此类。

张承志可谓超级“鲁迷”,在前后大约十年的时间内,张承志在研读了《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及《狂人日记》等后,不得被鲁迅所折服:“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现实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